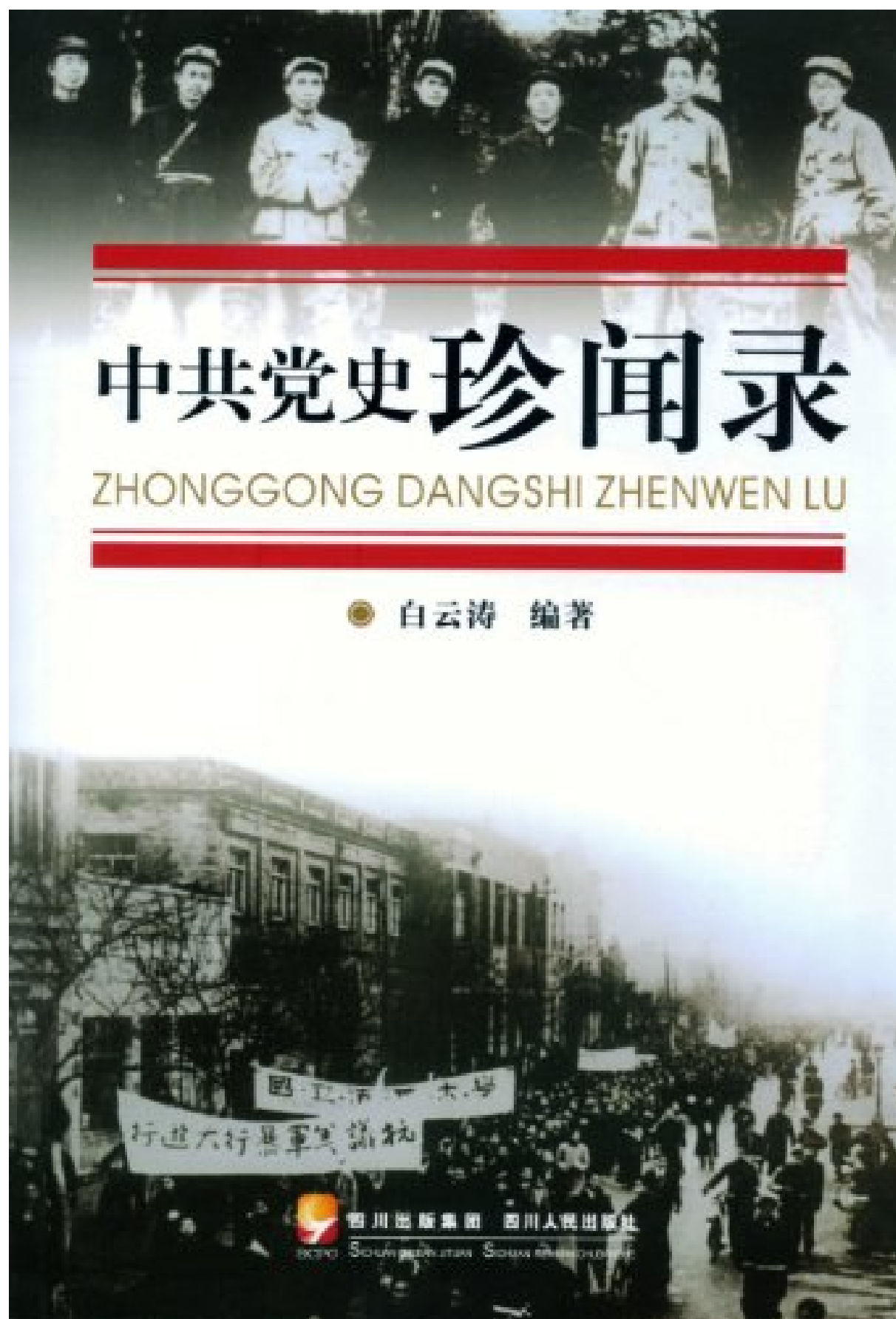


《中共党史珍闻录》摘抄

白云涛 著

2023 年 6 月 13 日



书本封面

1. 所谓“陈独秀问题”，实际上指的是陈独秀的历史评价问题。这个问题牵延数十年，成为党史研究中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2.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转向托洛茨基主义，成为中国托派领袖，最终被开除出党。
3. 当时中国还有“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我们的话”派）、“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同盟”（十月社）、“战斗社”三个“托派”组织，连同陈独秀的“托派”组织，一共四个。这四个“托派”组织互不统属，相互攻击，处于涣散状态。
4. 思想的先行者总是孤独地走在时代前列，引领着时代前进的方向。
5. 1932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的刘少奇，化名唐开元，告别妻子何葆贞和两岁的正在牙牙学语的二子刘允若，经过化装，在地下党交通员的保护下，乘坐一艘客轮，离开上海，向汕头转移，辗转前往中央苏区瑞金。1933年3月，何葆贞被国民党宪兵逮捕。1934年秋，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2岁。母亲何葆贞就义后，4岁的刘允若被地下党安排请人代为抚养，十二三岁到上海当学徒，经常以卖报纸、捡破烂为生，直到1946年被地下党在苏北找到，才回到刘少奇身边，进入延安保育小学学习。
6. 党中央领导机关从上海迁到苏区，结束了党中央机关远离革命根据地遥控指挥的局面，为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长期以来的党中央“左”倾领导创造了客观条件。
7. 1930年12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人到红20军抓捕“AB团”分子。红20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眼看自己也将被错定为“反革命”并遭逮捕，带着部队到富田，包围当地苏维埃政府，释放被错捕的近百名同志，高喊“反对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宣布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领导。这就是富田事变。
8.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党生死攸关的危

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使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得以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它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具有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9. 12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王明错误作出正式决议：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路线，自四中全会篡党开始，至五中全会达到顶点，使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及红军损失十分之九。此一错误路线虽经遵义会议开始克服，但在1937年12月会议至1938年9月六中全会期间，这个宗派又利用长江局进行其反党活动。“王明的投降主义，实质上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表，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是帮助国民党，瓦解共产党的腐蚀剂。”
10. “文革”之前，虽然中苏关系破裂，但王明并未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进行公开攻击。“文革”爆发后，王明开始连续发表一系列攻击中共共产党和反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文章，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毛泽东进行的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反革命政变》、《论中国事件》、《“文化革命”和毛同帝国主义合作的方针》、《“孤僧”的命运和毛泽东的十大》、《中共十五年》等。与此同时，王明还就延安整风写出《“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预演》一文，为自己的历史错误翻案。

1974年3月27日，王明在写完《中共十五年》后的第四天，病逝莫斯科，终年70岁。王明逝世后，苏联有关方面把他安葬在莫斯科郊外的新圣母公墓。1983年9月5日，王明妻子孟庆树也病逝莫斯科，被安葬在新圣母公墓。
11. 1921年7月在苏联召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23岁的瞿秋白对列宁进行了简短采访，成为中国记者采访列宁和介绍列宁直观印象的第一人。
12. 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了转发中纪委《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的通知，结束了对此案的复查工作。该报告明确宣布：“《多余的话》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

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的意图。”“客观全面地分析《多余的话》，它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

这个报告的发出，标志着对从 1964 年就开始罗织的“瞿秋白自首叛变案”的正式、彻底的平反。

13. 梅贻琦辞去教育部长后，国民党政府继续动员他“入阁”。梅贻琦“婉谢”不止，他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说：“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代。”随后一如胡适，去了美国。1955 年，台湾当局在新竹筹建清华大学，带有清华大学情结的梅贻琦奉召返台，主持筹建工作。1958 年，台湾清华大学建成，梅贻琦再任清华大学校长，因此被称“两岸清华校长”。

14. 梁漱溟出生于 1893 年 10 月 18 日，比毛泽东大两个月零几天。出生在“世代诗礼仁宦”家庭的梁漱溟，思想活跃且不断变换。早年一度崇信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算是个改良主义者；辛亥革命时期景仰孙中山并参加了同盟会京津支部，论起资格来是辛亥“老”人；随后又热衷社会主义，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制；20 岁起忽然潜心研究佛学，经过几年的反思，又转而研究儒学。梁漱溟不管研究什么，都有重大的思想成果产生。思想转得快，成果也出得多。所以，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国学大师、现代新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中国最后一位儒家”等等，一大堆称号，都落到他的头上。

梁漱溟学问高，名气大，性情也狂傲。梁漱溟曾言“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梁漱溟没有什么可怕的。梁漱溟还说：“‘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这正是我一生的使命。”1942 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1946 年李公朴、闻一多被杀，梁漱溟在演讲中激愤地说：“我要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死。我在这里等着他。”

15. 关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史家一般认为 1954 年到 1957 年是中苏两党两国的“蜜月期”。这一时期，继斯大林的对华不平等政策，将斯大林时代在双边关系中苏联非正常占有的一些权利主动归还给中国，扩大对华援助，在对美斗争中，双方也是互相合作、互相支持的。而 1954 年赫鲁晓夫首次访华，中苏双方签署了苏军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移交给中国政府、将四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国的协定，同时签署为中国提供 5.2 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帮助中国新建 15 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 141 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等 7 个文件。为此，1956 年毛泽东和南斯拉夫代表团谈话时还称赞“赫鲁晓夫是个好人”，“第一次与赫鲁晓夫同志见面，就很谈得来”，他取消了有损中国主权的“合作社”，“建立了信任”。学者也普遍认为赫鲁晓夫此次访华是中苏蜜月期的开端。
16. 所谓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指的是 1956 年 2 月 25 日上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由于这个报告没有列入大会议程，也没有邀请列席大会的各国共产党代表参加，是在深夜秘密状态下作的，故称“秘密报告”。
17. 赫鲁晓夫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同时也意味着对斯大林在世期间苏联共产党及其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知我否定。在美苏冷战和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仍在对峙的情况下，西方舆论界趁机贬低和丑化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掀起了一个世界范围的反苏反共浪潮。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社会主义阵营引起的震动远远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苏联高压铁幕后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和人民，通过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了解的斯大林排除异己的大清洗内幕，再联想到本国本民族在苏联高压政策下所走的主权不独立、民族不发展的道路，犹如晴天里的霹雳。1956 年 3 月 12 日，很大程度上是受不了赫鲁晓夫所揭露的内幕的刺激，参加秘密报告会议的波兰统一

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贝鲁特因心脏病突发在莫斯科去世。

思想的迷茫，怀疑的增长，促使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严重的分裂和混乱。在东欧，波兰、匈牙利等国家，长期以来脱离本国的实际，处处按斯大林的意志行事，照抄苏联模式进行革命和建设，这些国家的群众对本国政府和苏联的控制平时就不满，得知苏联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一下子几十万人上街游行，酿成著名的“波匈事件”。

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也受到巨大冲击。在意大利，“许多曾为党增光的优秀知识分子纷纷退党。党对工人的吸引力也远不如从前了。战后初期，24%的意大利工人加入了共产党，现在已不足14%”。在美国，“退党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在赫鲁晓夫发表关于斯大林的专门报告以后”，“我们有责任自己进行思考，再没有任何领导人可以靠自称万能和永远不犯错误而使别人立即效忠于他了。”

对于苏共不和各国共产党打招呼就揭露斯大林的错误，中国共产党是很不满意的。朱德对苏联方面讲：斯大林是国际国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他不仅属于苏联共产党，也属于各国共产党，你们对他进行如此尖锐的批评，却不同其他党商量，这不合适。

18. 民主革命时期，斯大林通过它所控制的共产国际，以中国共产党的“太上皇”身份，不顾中国的国情实际，直接对中国共产党发号施令，瞎指挥，给中国革命造成很大损失。这个问题，在党中央领导人当中，是人所共知的。在3月1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说：斯大林不仅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犯了错误，在中国党问题上也犯了错误。如立三路线，就与斯大林有关。尤其是王明路线，达三四年之久，直接与斯大林有关。

对于王稼祥的说法，毛泽东完全赞成，并把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所犯的错误归纳为四点：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斯大林支持王明，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百分之九十，把白区搞垮了百分之百。二、抗日战争时期，斯大林把王明从

莫斯科派回来，王明从“左”倾转向搞右倾。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决定把中国全都交给美国，交给蒋介石。四、斯大林对我不信任，说我是半个铁托或准铁托。在3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还说过历史上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这样的话，并说1949年底访问莫斯科那两个月很不好受。

19. 当时，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几乎已经全面否定斯大林，唯有中国共产党独树一帜，坚持对斯大林三七开。其实，赫鲁晓夫和苏共并不是全盘否定斯大林，他们所关心的是：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逐步形成的？它怎样在一定阶段上变成一系列极其严重地歪曲党的原则、歪曲党的民主和革命法制的根源的？另外，赫鲁晓夫好苏共认为斯大林并没有继承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而是重新回到了被列宁所否定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上，给苏联各方面建设带来空前的灾难。基于以上两点，赫鲁晓夫和苏共绝不认为斯大林是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是双方的根本分歧，后来的中苏两党十年大论战，都是围绕这个分歧展开的。

20. 学者们大多认为，1958年是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发生逆转的一年，而中国炮击金门是中苏破裂的导火索。

21. 过了20天，2月4日，在赫鲁晓夫支持下，《华沙条约》缔约国在莫斯科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赫鲁晓夫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支持他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全面彻底裁军”的建议。中共中央派康生等人作为中国观察员参加。会上，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要防止苏联在裁军问题上代我承担义务的精神，在表示赞成普遍裁军的同时，康生宣读了中国政府的声明：“中国一贯主张普标裁军，但是，由于美帝国主义一贯在国际关系中排斥中国，任何没有中国参加和正式签字的裁军协议，都不能对中国有约束力。”

中国政府的这一声明，在赫鲁晓夫看来，简直就是出尔反尔，是和苏联“全面裁军”建议唱对台戏。所以，在当天晚上举行的招待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团宴会上，赫鲁晓夫含沙射影地批评中共说：兄弟党之间是平等的，应该互相尊重，

提意见可以，但不可玩弄尖锐的词句，不应该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我们，不能认为只要是自己的话就是真理，就应该这样做。随即话锋一转，直接不点名地批评毛泽东：“我不同意说什么一旦发生战争，多少人会死亡，多少人会活下来。……我们要为人民着想，人民是怕战争的，他们不要战争。”“当然，我们对老年人是尊重的，但我们尊重的不是年纪的代傲，而是英明与否。年老而不英明，就像一双旧的套鞋一样，只能把它们放在屋角去供老年人欣赏。”这就是国际共运史上著名的把毛泽东比喻为“老套鞋”的讲话。

22. 26 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会议的决定，《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20 日发出的谴责赫鲁晓夫的声明，以示中国共产党对阿党的支持和对苏共的抗议。但赫鲁晓夫不为所动，二十二大后，宣布与阿尔巴尼亚断交。此后，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唯一“社会主义明灯”。
23. 俄罗斯哲学家索罗维耶夫的那句国家间“只有永恒的利益，而没有永远的友谊”的名言，对我们探讨中苏关系破裂原因，是一个重要的启迪。
24. 在民主革命时期，刘少奇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起了决定性作用，毛泽东对刘少奇也极为信任和支持，两人是互相支持和信任的亲密战友。
25. 毛泽东、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以及会议前后的分歧，表面上看是各讲各的，没有正面的辩难，但因为涉及到重大责任问题，明里暗里的冲突时隐时现，两人产生了微妙的难以言传的隔阂。但就当时而言，主要的仍然属于对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对严重经济形势产生的原因等等的工作认识上的分歧。
26. 在七千人大会前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农业中的“包产到户”问题，是毛刘分歧中的又一个重要政治问题。
27. 时任中南局书记的陶铸，1962 年 4 月到河南检查工作时，提出借土地给农民自耕，有的同志认为这样做可能导致资本主义。陶铸生气地回答说：“如果这也叫资本主

义，我宁可要资本主义，也不要饿饭、死人！”

28. 1980 年初，《中国青年》杂志社的同志采访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同志及其子女诸人。每当谈到孩子们东躲西藏，“卖血为生”，谈到孩子们寻找爸爸妈妈的艰辛，谈到自己狱中的悲戚生活，谈到刘少奇病重发高烧时，医护人员一边高呼口号一边骂一边打针，刘少奇两支胳膊和腿被针扎烂，“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谈到刘少奇长时间疼痛难忍，双手乱抓，“专案组”不给止痛，却给他两个硬塑料瓶子捏在手里，瓶子最后被攥成“葫芦”，谈到刘少奇含冤惨死时白发一尺多长，运往火葬场时双脚还在吉普车外面拖着时，60 多岁的王光美都不禁扭头哽咽，或暂时回到内房抽泣，待心情平静后再谈。

29. 2004 年夏，王光美亲自召集，刘源亲自联络，毛泽东和刘少奇两家后人在北京京都信苑大厦相聚一堂。83 岁高龄的王光美老人，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女儿李敏，李敏女儿孔东梅，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及夫婿王景清，李讷之子王效芝，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子女刘源、刘亭等人，参加了聚会。众人相见，一起问候王光美老人，然后彼此问身体，嘘冷问暖，其情亦重，其意深长。

30. 自此至 1970 年九届二中全会陈伯达政治生涯结束，陈伯达给毛泽东共做了 31 年秘书。其间陈伯达飞黄腾达，“文革”中一度跃居中共第四，起点也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这个岗位。

31. 在马列学院中，著名哲学家杨献珍只是个教育场，艾思奇是个普通哲学教员，著名文学评论家何其芳是个普通语文教员，而陈伯达居然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之下做副院长，可见其政治地位已经很高，中共“理论家”地位已经确定。

32. 1956 年，中共中央正式明确任命中共中央主席秘书，即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俗称“五大秘书”。当时，中共中央主席是毛泽东，所以中共中央主席秘书实际上就是毛泽东秘书。五大秘书的分工是：陈伯达、胡乔木为政治秘书，

叶子龙为机要秘书，田家英为日常秘书，江青为生活秘书。身为政研室主任的陈伯达是首席秘书。

33. 新中国成立以前，除《评〈中国之命运〉》之外，陈伯达还撰写发表了另外三篇影响巨大的政治著作，即 1945 年出版的《窃国大盗袁世凯》、1946 年出版的《中国四大家族》、1948 年出版的《人民公敌蒋介石》。
34. 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了重大错误，或者说成为人民的罪人，那是事实。但是，在民主革命时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陈伯达为打败蒋介石，为建立新中国，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起到了言论号角、舆论宣传的作用，也是事实。有人说共产党靠“两杆子”打天下，一个是枪杆子，一个是笔杆子。从历史事实看，陈伯达在共产党“笔杆子”打天下中，是立了汗马功劳的。
35. 1967 年 12 月 26 日，陈伯达来到唐山，在一次大会上发表演说。他说：中共冀东地区组织（指解放前期）“可能是国共合作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那里起作用，叛徒在那里起作用”。事实上，在抗日战争中，冀东是我著名敌后抗日根据地，当地党组织领导人民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殊死斗争，锻炼和培养出一大批优秀干部，他们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干部骨干。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别有用心地这一番讲话，把几十年间冀东的党组织、冀东的党员全部抹黑，致使包括唐山在内的整个冀东地区的新老党员，上至领导干部，下至村中的普通党员，许多人被戴上了叛徒、特务、内奸、假党员的帽子，84000 余人惨遭批斗，2955 人被迫害致死，株连到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一时冀东大地一片黑暗。这就是陈伯达制造的“冀东惨案”。
36. 国际上公认《毛主席语录》“是 20 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书”。国外一些组织统计后还认为《毛泽东语录》是全球历史上印量仅次于《圣经》的出版物。

37.《毛主席语录》还直接用于“反帝、反修”的国内外“战场”。

我驻某国使馆造反派，在大街上散发印有“造反有理”语录的传单，东道国提出抗议；我驻某国使馆造反派要在使馆屋顶上用霓虹灯制成语录牌，宣称要让这里的人民看到金光四射的毛泽东思想；去某国援建的工程人员中的造反派，要在工地上竖起一块“社会主义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巨幅毛主席语录标语牌，当局不同意，他们集合抗议，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我驻非洲某国使馆的造反派，在公共汽车里朗读毛主席语录，在街头向来往行人硬塞“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对拒绝接受的群众挥拳辱骂，引起群众愤怒。

38. 1968年初秋，北京某大学哲学系主任、有名的康德研究专家，由于席地而坐时，垫在屁股底下的笔记本中夹着一本《毛主席语录》，而被打成反革命。

39. 总政治部直属单位有位同志，在参加会议时，不经意间把手中的《毛主席语录》插进了跷起的二郎腿的裤腿中，被“政治嗅觉特别灵敏”的人看见，当场大喝道：“我们这个会场出现了反革命！你们看！他把红宝书放到哪里去了！”当事人马上立起请罪，人们不依不饶，除现场批斗外，还继续进行政治审查。他惊恐万分，会后不久，跳楼而死。